

15. 詹姆斯·伯克著《我的父亲在中国》有关宋氏家族的记载

译者按：《我的父亲在中国》是美国监理公会在华传教士威廉·伯克(William B. Burke, 中文名步惠廉)的生平传记,其中部分章节涉及威廉·伯克与宋氏家族的渊源。该书作者詹姆斯·伯克(James Burke, 中文名布雅各)是威廉·伯克的第五个儿子,系威廉·伯克与其续弦莉拉·杰尔丁(Leila Gerdine)的次子。詹姆斯·伯克曾任美国《时代》杂志驻远东记者,为了撰写父亲的生平,他曾于1941年在香港访问了宋蔼龄和宋美龄。宋蔼龄在重庆时阅读并修改了该书有关宋氏家族的章节。在撰写过程中,他还得到了许多其他有关人士的帮助。林乐知的外孙刘兆慧(George Loehr)为他提供了林氏的来往信件,他从中发现了宋耀如在美国写给生父的第一封信;其兄长、时任美国驻天津领事馆的副领事戈登·伯克(Gordon L. Burke, 中文名步戈登)也积极地帮助了他;许多监理公会布道团传教士如约翰·克莱因(John W. Cline, 中文名葛费恩)、西德尼·安迪生(Sidney Anderson)、约翰·霍克(John Hawk, 中文名霍约翰)等人也给予了他大力协助;对他帮助最大的是他的父亲、该书传主步惠廉,步氏将自己长达55年的日记悉数交给儿子阅读,并充满耐心地回答了其子无数的问题。1942年6月,布雅各在华盛顿完成撰稿工作。随后该书在纽约和多伦多由FARRAR & RINEHART, INC出版。

酝酿中的传教士

比尔·伯克^①的房间没有多少神学院寝室的味道。

就此而言,这可能是卫斯理堂(Wesley Hall)^②或者是整个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比较切合实际的方面之一。1884至1885学年,每当阅读希腊文或《保罗书信》^③感觉负担,需

① 即威廉·伯克(William B. Burke)的昵称。中文名步惠廉,1864年生于美国。1884年入学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的范德比尔特大学。与同学宋耀如是好朋友,1885年同年毕业。1887年被监理公会派遣来华,在苏州传教,后调往松江,1934年退休回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重回松江传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于1942年被日本人遣送回美国。1947年在美逝世。——原注

② 范德比尔特大学内的一个学生宿舍楼。步惠廉和宋耀如均居住在此楼。——原注

③ 《新约圣经》中《使徒书信》的主要部分。传说是使徒保罗写给各地教会或个人的信。依次编为《罗马书》、《哥林多书》(前、后卷)、《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歌罗西书》、《帖撒罗尼迦书》(前、后卷)、《提摩太书》(前、后卷)、《提多书》、《腓利门书》、《希伯来书》,共14卷。这些“书信”的大部分,都是长篇论述,广泛论述了信仰、神学、伦理等问题,成为后世基督教教义、教规的重要依据之一;也是研究早期基督教思想史的重要文献。书信均以当时流行的希腊文写成。——原注

要片刻转移精神的时候,神学家们就习惯地聚集在那里。事实上,这种“转移”是如此频繁,以至于比尔的一位不善社交的室友在该学年开始一个月后便申请住进了单人房间。

比尔之所以受欢迎并不是由于他擅长辞令。他绝不是一个健谈的人,但是具有十分善良的本性。因为这一点,再加上他那爱好争论任何话题的爱尔兰人习性,所以只要他的观点一有争议,他便自然成为大学讨论会的核心。

正是由于期盼这样一个讨论会,一天下午,几位年轻的神学者走上了通往这一房间的楼梯来开会。其中之一是一个矮小的中国人,他的名字相当独特,叫查尔斯·琼斯·宋(Charles Jones Soon)(Soon 多年后改拼为 Soong)。半个世纪以来,他被视作传奇人物,因为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一群兄弟姐妹的父亲,是中国无冕的“宋家王朝”的奠基人。然而,在范德比尔特,他只是查理·宋(Charlie Soon),一个安静的、刻苦的中国人,懂得如何友善地对待别人,尤其是他的大学同学,因为事实上他既不是洗衣工也不是厨师。

当同学们进入比尔的住所时,他们突然留意到眼前只有在肖托夸(Chautauqua)^①阳台上才可能有的有趣景象。一只通常应靠墙放的小写字台,被铺上毯子放在了房间中央。写字台上是一只从屋角的洗脸架上取下来的洗脸盆,里面盛满了水。盆底有一枚闪光的银币,透过水看上去放大了。除了这些看得见的东西以外,盆旁还放着一只笨重的带金属手柄的熨斗。来访者看不见的是桌子底下的一组自制蓄电池,以及毯子底下一根通往熨斗底部和脸盆的细铜丝。

“快进来,快进来。”比尔一本正经地招呼道。他正坐在他的

① 即美国爱荷华州境内的一个印第安部落。——原注

床边。他是一个结实的圆脸小伙子,体重两百多磅,身高六英尺二,体型匀称。他说话的时候,深灰色的眼中跳动着某种恶作剧的东西。

“今天,我为你们大家准备了一个小小的奇观,”他宣布道,“是桌子上的那只熨斗。它是被施了魔法的,来自火雾山上的女巫洞。任何人碰到它便会失去意志力。为了证明这一点,你们中谁如果能在握着熨斗的时候拿起那枚银币,我就把它送给谁。”

没有人动。

“你怎么样,查理?”比尔问。

宋在叫声的刺激下小心地走上前去。他谨慎地盯着熨斗和盆中,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于是,他一手握起熨斗的手柄,并把另一手伸进水里。带着一声惊叫,他被震得弹了回去,银币依旧留在盆底。然而,几乎在比尔爆发出大笑声之前,他惊讶的表情就已经转为羞怯的笑容了。正是这种从未逝去的幽默感使得两人自在范德比尔特认识的第二天起便成为亲密的朋友。

比尔于 1884 年秋进入田纳西的学校^①读书。他只有 20 岁。就在一年前,在他 19 岁生日的前几天,他获得了佐治亚州牛津市爱默生学院(即现在的爱默生大学 Emory University,靠近亚特兰大)的学士学位。后来,他把重心放在了医学上,并在昆西(佛罗里达州)高中谋得校长一职,他在他的寄宿处堆满了医学书籍,还有一副人体骨骼,为报考医学院做准备。但是教书以及做校长的巨大压力,一度遏制了他对自然科学的爱好。

暑假期间,在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家中,比尔感受到了牧师工作的召唤。这一想法大概最早植根于他幼时与父亲约翰·W. 伯

① 即范德比尔特大学。——原注

克牧师(John W. Burke)一起驾着双轮单座轻马车去巡环^①时,他父亲是监理公会南佐治亚州议会的会员。无论如何,他在昆西一年以后,这一想法成熟了起来。比尔辞去校长一职,注册进入范德比尔特神学院(Vanderbilt Theological School)就读。

比尔在范德比尔特燃起传教的热情是必然的。至于热情,这只是刚开始而已。在八九十年代,美国新教各布道团的巨大组织力量正在发展中。传教士们利用假期在教堂、大学演讲,为“基督在黑暗大地上的战线”征募人力和财力。传教团体在每一个城镇和乡村涌现。单 监理公会女子传教团(Southern Methodist Woman's Missionary Society)就夸口在1885年有44 362名成员,并自称是“为上帝获得异教徒的真正有效的代理人”。青少年传教团也成立了,其成员被称为“小工人”。在铁路公司允许给会议代表特价的情况下,庞大的传教士议会会议和群众会议召开。

而且,在范德比尔特也出现了这一景象,查理·宋十分关注这些发展。宋准备以基督教传教士的身份回到他的祖国——主要的“黑暗大地”之一。

近年来,虽然宋的早期冒险活动被添油加醋地反复述说,但却没有多少重要的事实。他出生在位于中国南部海岸的海南,在被一位没有孩子的堂舅收养后,最终在那个亲戚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开的茶丝店当学徒。在那里,他经常与一群中国留学生交往,这些学生是由清政府派往美国的第一批留学生。宋想要受教育的志向被刺激起来。1880年,14岁的宋逃离堂舅处,偷偷溜上一艘停在波士顿港里的沿海岸航行的明轮船。船主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名叫查尔斯·琼斯(Charles Jones),他被这个男孩的

① 巡环(circuit),又称“循环”,分散在相当距离之内的两个以上的地方教堂彼此联合起来,由一位牧师管理而构成一个牧区者。——原注

精神所打动,让他作为船上的一名仆役跟着航行了一段时间后,把他留在了北卡罗来纳州威明顿的一位监理公会牧师家里。在这位教区牧师的家里,在经过几天牧师的仁慈接待和每日祈祷后,这个易受影响的男孩皈依了基督教。他受了洗礼,取教名查尔斯·琼斯,以感谢船长。1880年11月7日的威明顿《星报》预告这次施洗仪式道:

“今天上午,第五街监理公会教堂将举行洗礼仪式。一位中国皈依者将是这神圣仪式中的一员,迄今为止,他也许是在北卡罗来纳州接受洗礼的第一位‘天朝人’。”

两天后,在同一份报纸上,一报道形容该仪式“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仪式结束后,宋在教堂里来回走动,同每一个人握手。他告诉了他们一切,他告诉人们他是如何找到救世主的,以及他希望返回中国并向他的同胞介绍耶稣基督的救助。

善良的教徒们强烈呼吁派遣一名被救赎的异教徒回到异教徒当中去。达勒姆市的朱利安·S. 卡尔(Julian S. Carr)将军对此十分感兴趣,他是一名南部邦联的退伍军人和富裕的烟草商。他把这个年轻的中国人带回家,并在做了少量准备工作后,把他送往圣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即现在的杜克大学 Duke University)。

这时,宋写了两封信,它们也许是宋的人生到那时为止所留下来的唯一的第一手文献。一封信是给他父亲的,它被附在另一封给上海监理公会布道团团长杨·J. 艾伦(Young J. Allen,中文名林乐知)博士的信中。宋要求艾伦博士找到父亲并把信交给他。但是,从上海到华南地区就像从北卡罗来纳州到那一样是不可能的,这一事实是这个中国青年所无法想象的。考虑到宋只有15岁,而且学英语才不到一年,这些信写得相当好,足以证明这个

男孩的才智。给艾伦博士的信如下：

美利坚合众国
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
1881年6月25日

艾伦先生

亲爱的先生：

我希望您能帮我一个忙，我离家已有六年，我希望我父亲能够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和在干什么，他们住在中国东南部的广东省文昌县，他们有帆船从澳门驶往海口，约走六天的水路，我父亲的中文名字是“Hann Hong Jos'k”。我希望您能找到他们，我已于数月前在北卡罗来纳州威明顿市皈依，现在达勒姆主日学校和圣三一学院在帮助我，所以我急于接受教育，以使我可以回到中国，告诉人们关于我们救世主的事，收到信后请回信，我为此非常感谢您。再见。

您恭敬的
查理·琼斯·宋

给他父亲的信较长，如下：

美利坚合众国
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
1881年6月25日

亲爱的父亲：

我写这封信是想告诉您我现在在哪儿。我于1878年与哥哥分别，离开东印度群岛来到美国，并幸运地找到了我们的救世主

基督。因为基督的缘故,上帝就在我的面前。现在达勒姆主日学校和圣三一(学院)在帮助我,我急于接受教育,以便能回到中国,把达勒姆朋友们的友善和上帝的仁慈告诉您。他派他的独子在这个世界里为所有罪人受死。我是个罪人,但由于上帝的恩典而得救。我记得我小时候,您带我到大庙里去拜那些木头做的神像。哦,父亲,木头神像不会帮助人,纵然您礼拜一辈子也没有一点好处。在我们过去的时代里,人们对基督一无所知。但是现在我已找到救世主,不论我走到哪里,他都会安慰我。请您竖起耳朵听,您能听到神在说话,请您抬起眼睛看,您能看到上帝的光辉。我信赖上帝,希望凭上帝的旨意在这个世界上再见您。我们现在正在度假,我住在达勒姆的J. S. 卡尔先生的家里。收到我的信后请立即回信,我将非常高兴得到您的消息。我爱您,也请向母亲、兄弟姐妹们转达我的爱意。下次写信时我会告诉您更多的事情。卡尔先生和夫人一家是非常好的基督教家庭,在我认识他们之前,他们就对我很亲切。

Hann Cardson

查理·琼斯·宋

人们会猜想他父亲收到这封信并把它翻译出来后的反应。事实上,他从未收到它。艾伦博士没法找到他,便把信夹在他自己的文件中带走了。

有趣的是,这封信揭示了宋的原姓似乎本不是宋,而是韩。他的罗马注音(他自己的名字“Hann Cardson”和他父亲的名字“Hann Hong Jos'k”)看来是一种中国南部的方言音。但是,宋还在信尾用中文写了名字。这些文字翻译成标准的中国官话注音应该是“Hann Chiao-shun”(宋的名字)和“Hann Hung-yi”(宋父亲的名字)。这里的韩是一种常见的中国姓氏,起源于中国古代

封建王国韩国(不是大王朝)。宋没有改换他的名字“教准(Chiao-shun)”(用上海话念或者是“高真(Kyau-tsung)”),因为当他回到中国时,他仍然在使用此名。

在范德比尔特,宋从来不提名字的事情。当然,可能的假设是,因为那位领养了这个年轻人的堂舅姓宋,姓氏便随着领养关系而改变。这在中国是普遍的习惯。后来,在宋去世以后,他的孩子们以他本姓宋非姓韩为事实,给出了另一种解释。长女孔祥瑞夫人写道:

“关于你在信中提到的我父亲自己署名为韩教准的事情,这很容易解释。他父亲的妹妹没有儿子,所以当他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他被认作宋家和韩家两家共同的孩子,以保证每年清明时韩家坟前香烟不断。”

要不是对一个中国人来说一人同时代表两个家族是非常不寻常的事情,那么这个回答便是理由充分的。这又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韩鸿翼只是他的养父,宋为什么不试图与生父联系。而且如果韩是没有孩子的姨父,宋为什么会在信中提到他的“兄弟姐妹”?更充分的解释可能要出自正宗的宋氏家族史了,该家族的成员目前正在考虑这项工作。

给艾伦博士和“我的父亲”的信还提供了—个证据,即虽然这个男孩于1875年就离开了家,但他直到1878年才到美国。这与大多数称宋离家后就直接到了美国的描写相矛盾。这三年他和他哥哥在东印度或其他地方的活动只能是有—趣的想象,因为从来没有人听他谈论过这件事。

最后,信里有很多地方显示了宋在宗教皈依方面的虔诚和他要回中国传教的热情。依旧在卡尔将军的资助下,这个年轻人于1882年来到范德比尔特学习神学的时候,这份虔诚和热情丝毫没有减少。之后的夏天,他用大有长进的英语水平再次给艾伦博士

写了一封信：

范德比尔特大学卫斯理堂

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

1883年7月27日

我亲爱的艾伦博士：

您友好的来信已收到多日，我确实非常高兴收到它。我知道您将您的工作、生命和心灵全部奉献给了上帝。我希望能按上帝的旨意很快见到您。我不知道我还要在美国待多久，但我将尽可能彻底地做好准备。当我完成我的学业后，我希望我能把光明带给中国人。我活着的目的是行善、敬人、赞美上帝；为别人做好事，将他们从无尽的惩罚中拯救出来。愿上帝帮助我。几天前，监理公会的一位女士问了我一个不寻常的怪问题，她说：“哎，宋兄弟，你是一个传教士，你是否愿意为基督的事业蒙受一切磨难并且牺牲生命？”我认为对我来说这是个奇怪的问题。但是，为了我的良心，我据实回答。我回答道：“是的，夫人，如果上帝帮助我，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愿意为基督受苦。”她又说：“我们应该这样去想，因为如果我们相信上帝，他就会帮助我们。”愿上帝帮助我们大家，把我们的财富置于天国，并使我们以极大的热情侍奉他，最后，我们也许可以说：“我已忠于信仰，我已打了一场胜仗，从今以后，我将得到生命的荣耀。”上帝保佑您和您的全部工作。

查尔斯·J. 宋

伯克和宋在1885年春天离开了范德比尔特，暂时分开。这位年轻的佐治亚人还没有明确感觉到传教地区的召唤。他回到了梅肯，在南佐治亚州议会上受按立礼^①，并被派往佐治亚州西南部

① 按立礼(Ordination)，即正式授予牧师职务的仪式。——原注

的巡环布道。宋在北卡罗来纳州议会上受按立礼。假如那时宋可以走自己的路,他会在回中国前紧接着他的神学外再进行一些医学知识的速成学习。可是教会的神父们却不这么想。会督 H. N. 马克蒂耶为宣布派宋去中国传教而给艾伦博士写了一封信,信中也持同一观点。会督信的全文如下:

范德比尔特大学

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

1885 年 7 月 8 日

亲爱的艾伦博士:

我们希望今年秋天把宋和帕克医生一起派去你处。我相信你会马上派他去做巡回布道工作,即使没有车马也要徒步而去。宋希望再多留一两年学医,以使自己更有用处等等。而他慷慨的资助人朱利安·卡尔先生也愿意继续帮助他。

但是我们认为,不应该在他还没有在中国人当中努力工作之前,就把他身上的中国佬习性耗尽。他早已“尝过了安乐椅的滋味”,并且不反对享受高级文明的惬意。这不是他的错。

让我们的年轻人,这个我们在他身上付出辛劳的人,开始去工作吧。把他投入社会各个阶层之中去,而不是待在一边。他要学习医学的愿望已得到答复:布道团所需的医生已经足够了,多一个也不要。

我深切希望,在你的正确引导下,我们的宋会做好的。如果他做到了,将会使这里的类似工作大受鼓舞。他的情况关系到许多人的命运……

你的主内兄弟

H. N. 马克蒂耶

可惜,这位会督没有活着看到他最后的那句话是怎样的一个

预言。

三 黑暗大地

.....

那天上午^①，会议在苏州的天赐庄教堂（Tien S Tsaung Church）^②举行，正式称谓是“监理公会在华布道团第二届年议会”（Second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hina Mission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这次会议规模不大，因为布道团只有七名传教士，其中一个中国人，伯克在艾伦博士陪伴下步入教堂院子时遇到了他。他一直没认出对方，直到艾伦博士说：

“伯克兄弟，请来见见宋兄弟，我们议会的第一位华人会员。”

伯克急步上前，说：“嗨，查理，真高兴又见到你了！有两年了！”他用双手紧紧握住宋的小手，使劲地握了足有半分钟。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比尔！”宋高兴地说，“你的胡子让我没认出你来。”

“是呀，你的这身中式打扮也没让我认出你来。”伯克笑道，“我觉得它使你看起来好老。”宋身穿一件中国长衫，头戴一顶丝质黑色瓜皮帽。他的脸更圆了，几乎鼓了起来。

一种熟悉的光芒出现在宋的眼睛里。他笑道：“你没把那个魔术熨斗带来吧？”

“没有，”伯克咯咯笑道，“但我想我得重装一只。”

① 即1887年10月。——原注

② 即今苏州圣约翰堂前身，1881年由潘慎文（Alvin Pierson Parker）在天赐庄折桂桥弄口购地而建，是监理公会在苏州的首堂。——原注

四

投入社会各个阶层之中

在会议的第一天之后,宋和伯克聚在一起召开了另一次范德比尔特的会议。宋第一次讲述了他的故事。

1885年12月,他和监理公会传教医师W. H. 帕克医生一起启程回中国。宋对这次横贯美国大陆的火车旅行记忆深刻。估计那时杰欧尼莫族(Geronimo)^①的首长在作战时,被反叛的阿帕切族(Apache)^②人赶了出来。一天,当火车开过亚利桑那州时,列车长跑到宋和帕克坐的车厢里来。他十分激动,指着一块平原说:那里有一队杰欧尼莫武士,那个可怕的首长也许就在他们中间。他们赤身裸体,身上涂了颜料,排成一队,在他们的小矮马的背上,他们的身体整齐地向前倾着。

1886年1月,宋跟帕克医生抵达上海后,一起直接去了苏州,在那里与这位单身的外科医生在一个房间里共住了几个星期。后来,他搬到了一位当地牧师曹子实^③的住处,以便有更多的机会学习语言——这位中国南方的青年学习上海话之难,就像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学习法语那样。

曹以他的教名查理·马歇尔(Charlie K. Marshall)著称,他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人,从小就被D. C. 凯利(D. C. Kelley)^④医生带到了美国。凯利医生是上海监理公会的传教士之一。美国爆发南北战争时,凯利医生加入南军,成为一名上校。马歇尔作为

① 即美洲印第安部落族。——原注

② 即美洲印第安部落族。——原注

③ 曹子实,浙江嘉兴人,监理公会在苏州博习书院的开拓者之一。——原注

④ 中文名雷大卫。监理公会传教医师。1854年来华,1886年因对林乐知不满而转赴日本传教。——原注

他的仆人跟随着他,这使他常与其他南军军官的黑奴在一起。他在美国南部生活了 14 年,而这样的四年生活^①使他的口音带上了浓重的南方土腔。

当宋跟马歇尔学上海话时,这位老人总用英语这一他们唯一可交流的语言来解释。听马歇尔讲话对他的这位受过较好教育的同伴来说是一种无尽的烦恼。语言课常常发展成宋纠正马歇尔的英文,而不是马歇尔纠正宋的上海话。一天,马歇尔终于发作了。

“你,你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你!”他用浓重的美国南方土腔叫道,“你干吗老是用那种北方佬的讲法来纠缠我。我讲英语的时候你还没出世呢。给我滚开,别烦我。”

在布道团的最初这几天里,宋横跨上海跑到南翔一所教会女校校长洛克·蓝金(Lockie Rankin)^②小姐处。蓝金小姐是监理公会第一位女传教士。因为是“一位精通古今语言的单身女性”,她被推荐给差会^③,于 1878 年来华就职。她十分推崇中国古老传统中的许多保守的地方,尤其是青年男女在结婚前不可见面的习俗。在对此一点都不了解的情况下,宋跑到南翔,以美国方式直接向蓝金小姐要求是否可以与学校里的一位年轻教师见面。这位善良的女士坚决地回绝了他,并把那位教师锁进她房里,直到宋离开镇上为止。

一位监理公会的妇女怎么会影响整个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这种古怪的想法怎么想都令人觉得好笑。

宋对部分传教士的严厉丝毫没有准备。这与威明顿、达勒姆

① 指战争期间的四年。——原注

② 中文名雷金贞。——原注

③ 差会(mission board),基督教新教差派传教士进行传教活动的组织,形式上多由教会办理,也有不从属于任何教会而独立组织者。——原注

和纳什维尔的友好的、助人为乐的气氛完全不同。布道团团长看上去是那些反对他的人之一。宋对他的“专制方式”十分抱怨。而且,必须承认,艾伦博士有时是相当严厉的。也许在对待宋这件事上过分严厉了。在宋这位年轻的中国人来到布道团之前,他自己就已经下了结论。正如 1886 年 1 月 12 日他给差会写信所揭示的那样:

……还有一条——第 10 条——这是我希望提一提的——就是宋先生的薪水问题。他将于两天后到这儿来,我还不知道差会希望怎样对待他,怎样解决他的地位和报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令人为难的地方。我们中西书院的男孩子和年轻人远比他优秀——我指的是学习好的人——因为他们学贯中西,不仅能够而且已经在进行写作和翻译。他们的成果在传教士公开会议上进行展示和评价时,得到了最年长和最有才干的传教士们的赞扬。但宋决不会成为一个国学大师,最多只是一个失去民族特征的中国人。除非给他的报酬和地位远远超过他所应得的,他是不会满意和高兴的。——结果是,我发现我们当中谁也不愿带上他。

因此,宋来到布道团时,已经或多或少地注定没有成功的机会了。

在对艾伦博士的过分严厉表示反对之前,我们应该了解,这位老传教士对教育的热情和以教育为手段的传教方式。他曾经说,他的传教工作是“到一个由士大夫统治的帝国传教,是对那些唯有印刷品才能吸引他们的人传教”。他聚集了一些中国学者在身边,帮助他把他的思想组织成装腔作势、晦涩难懂的文理,或是书面语言,以使那种吸引得以实现,然后继续进行大规模的写作和翻译。他的著作和小册子包含了社会学、政治学内容和宗教要义,上自皇帝下到一般官员都在阅读。作为回报,艾伦被政府授

予官职^①，他的住宅被尊称为官邸。

他对在文盲(占中国人口的 90%)中进行直接的传播福音工作没什么耐心。事实上，很明显，他喜欢一个货真价实的中国官吏，而对普通人却很冷淡。除学者以外，他从不邀请中国人到他家中去，他歧视布道团中绝大多数华人布道员，包括宋本人。艾伦从不掩饰他对国内的教会和差会的不满，因为他们把如此仓促地接受肤浅教育的宋派出来给他。

艾伦的教育热情使他无视鼓舞着宋的传教志向和赤诚之心。这位年轻的海南人在他有限的机会中尽可能地做好。若不是马克蒂耶会督决定“他身上的中国佬习性不应被耗光”，他也许还能做得更好。如果能在艾伦那里得到些许同情，宋也许会把自己放在布道团更有用的位置上。事实是，这个小伙子发现自己受到的只有冷遇，不仅来自布道团团长，还来自上海当地的居民。

对上海人来说，宋是那种“没有国籍的中国佬”。他对他们的语言和习俗一无所知——中国南方的语言与北方的语言是非常不同的。他既因不能被当地人视为同类而得不到尊重，同样也因不是真正的西方人而被看轻。事实上，他毫无地位。当他出现时，孩子们尖叫着“洋鬼子”跑开，大人们叫他小矮子。宋痛苦地认识到，当美国教会热情地希望他成为一名传教士的时候，他们以及他本人对中国教会的了解太少了。

宋不快的处境因为一群布道团成员的友谊而暂时得到改善。这些传教士是传统福音派的拥护者。他们反对艾伦博士的教育策略，相信学校应该“自然地增加而不是被人为地硬性建立起来”。他们属于传统的激进派传教士类型，热切地渴望像圣徒保罗那样传播福音。教育派和福音派之间的冲突，导致后者中的一

① 指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编译一职。——原注

些人在宋到达的几个月后,脱离了艾伦的管制范围,在日本建立了布道团。宋试图转到这个新布道团去,但没有成功。

在不到一年的基础学习和一些教学工作后,马克蒂耶会督的建议(“把他投到社会各个阶层之中去”)被彻底地实施了。他被派往介于上海和苏州之间的昆山巡回传教。在那里,他独自一人生活,面对一个他完全不能适应的工作。

接着,牛尚周出现了。牛是在波士顿激起宋的年轻人志向的中国留学生之一。宋回到中国后,两人又在上海再次相遇。牛对他的这位年轻朋友的问题表示同情,建议说娶个妻子至少能排解他在昆山的寂寞。宋表示同意,并详细叙述了他在那方面在蓝金小姐的学校所做的失败努力。不过,牛有答案。他知道宋在西方度过的岁月没有激发起他对中国传统的那种不识字的小脚贤淑女子的兴趣,出现在牛脑中的第一个人就是他自己 19 岁的小姨子,倪珪贞小姐。牛做了详细的介绍。

倪小姐是徐光启的直系后裔,徐光启是著名的明代内阁大学士,1601 年由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施洗皈依基督教。她的母亲出生在徐家汇(Zikawa 是当地方言的拼法,更流行的拼法是 Siccawei,位于上海西郊)的徐氏老宅,在嫁给倪先生之前一直住在那里,是一个天主教徒(自从先祖皈依基督教后,徐家人对天主教的信仰一直十分坚定)。倪是一位家庭教师和才华横溢的学者,但他没有选择成为天主教徒。相反,他由上海的伦敦会施洗皈依了基督教新教。他的妻子跟随他改信新教。

珪贞是倪家的第三个女儿——在中国这并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排行。在她四岁时,她的脚被痛苦地裹了起来,每天紧紧地用布条裹成那时规定的形状。但她的反应比常人更糟。她每天晚上发高烧,不得不把布条松开。最后,她的父母决定,既然她是第三个女孩,而且她也不用非嫁出去不可,那就可以让她的脚自

然长大。他们知道,没有一个中国士绅会考虑娶一个“大”脚姑娘。

珪贞的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是她很早就显示出对读书的兴趣,这一点令她的学者父亲感到满意。他鼓励她学。她五岁时跟着一个家庭教师学写汉字、读古籍,而不是做更多的诸如针线活这样的女工。在她九岁的时候,她进入由上海的女公会(the Woman's Union Mission of Shanghai)开办的教会学校裨文女塾(Bridgman School for Girls)^①读书。她在这所学校不仅为她日后浓厚的宗教个性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而且还养就了对数学尤其是三角学的嗜好。她18岁毕业。对家中的女性成员而言,她是一只名副其实的丑小鸭,不具备她这一性别该有的任何一种传统的优雅。

当牛结束这一故事时,宋很起劲,并且渴望马上见到珪贞。但是他们没有考虑长辈倪妈妈的因素。她以家族的高贵血统为荣,不会允许女儿打破自古以来的规矩,与一个未婚男子公开见面。如果宋想求婚,他应该以传统的方式进行——依靠媒人。

实际上,倪妈妈正在做对宋有益的事情。因为既然他不懂上海的讲话方式和礼貌方式,他无疑会比这个上海姑娘表现得还要糟得多,所以没有强迫他来求婚。正因为这样,牛毛遂自荐做媒人——这是一个在中国通常由干瘪老太婆担任的专职。他在两

① 裨文女塾是上海开埠后的第一所新式女子学校,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的夫人艾丽莎·格兰德(Eliza Gillette)于1850年4月15日创设于上海西门外白云观隔壁(今方斜路西林后路102号)。经费大部分来自教会拨款和社会捐款,其中又以女公会所赠款数最多。1871年裨治文夫人去世,学校由女公会和圣公会管理。1881年移交女公会单独管理,原圣公会系统的教职员工及中学部学生并入另一所圣公会女校——文纪女塾,称圣玛利亚女中,并改为寄宿制,迁址圣约翰书院之北。原西门的裨文女校仍用旧名。早期实行免费教育,1900年起每月向学生收学费五角。1951年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改名“沪南女子中学”。1953年8月又改名“上海市第九女子中学”。1966年取消女中,遂改名“上海市第九中学”。——原注

边来回跑,报告对方的优点和缺点。宋被完全接受了,他和珪贞在一位监理公会传教士克拉伦斯·里德(Clarence Reid)^①的主持下结了婚。

最后,凑巧也单身的温秉忠与倪家剩下的一个妹妹结了婚。像牛一样,温是宋在波士顿遇到的中国留学生之一。他们三人又像过去那样(聚在了一起),只是宋现在是连襟而不是一名圈外的茶丝店学徒。

那天,当伯克和宋结束他们的苏州会议时,已是深夜。伯克为他同学的婚姻而高兴,但是他们谈到的一件事使他不安。这就是宋披露的两派传教士在传教方针上的分裂。他立刻决定不让自己卷入任何这类冲突。他到中国来是为了传播救世福音,他希望看准了福音派或教育派再工作,但工作一定要做。争论一件事该如何做只会分散做这件事的精力。

苏州的年议会开了五天,最后一天公布了分派名单。宋被派回昆山,伯克则被派到上海地区的地方首府松江县去建立一个新的布道点。

休会时,伯奈尔^②走向他旧时的学生,告诉他一个令人“欣慰”的消息。前一年,一名长老会传教士在街上兜售宗教小册子时,人们向他扔掷石头,把他赶出了松江。几乎是同时,在那个城市,一群学生烧毁了天主教布道团的财产。

这些暴力事件并不限于1886年的松江。它们遍及全中国,以反对在美国发生的类似的某些不文明的反华暴力事件。天国人在这片土地上成为廉价的劳动力后,西方列强强迫中国尊重外国人。1887年,北京发布告示,号召中国人“与基督教传教士和陆相

① 中文名李德。1879年来华传教,1896年转去朝鲜传教。——原注

② 全名W. B. Bonnell,中文名冯昌黎。1884年来华传教,1895年返回美国。是步惠廉在梅肯读高中时的老师。——原注

处”。美国教会赞赏中方的这种“自愿的”宗教宽容,但美国却依旧让它的中国居民面对暴徒的“仁慈”,依旧对羞辱中国的排华法案不置一词。

六

过境昆山^①

.....

当快轮停靠在昆山的茶馆码头时,天色已晚。伯克计划到宋处过夜。他已经给他的这位同学写过信,而后者正在茶馆等他。

“欢迎来昆山。”当这个高大的传教士登上码头时,他高兴地招呼道。人群开始拥到他们身边。昆山人和苏州人一样对外国人感觉好奇。

“两个洋鬼子。一个大块头 and 一个小矮子。”一个看上去像乡巴佬一样的人大声庆祝道。

“比尔,你看到吗?”宋歪着嘴说,“外国人把我当中国人,而这儿你则看到一个中国人说我是外国人。”

两个朋友向 15 英里外的布道团教区牧师住处走去。那群人跟在后面。这天是年初四晚上,是持续一个月的庆典中的几个喧闹的高潮之一。当两人走在狭窄而弯曲的街道上时,到处都在放鞭炮,不断有铜锣声响起。

“并不是欢迎你,比尔。”宋揶揄道,“我很抱歉。这是为了迎接财神。”

如果这个年轻的传教士能透过已经拉上的木板,看到一家店的里面,他会看到一张铺了台布的桌子上摆满了食物。它们都是

① 这一章节的故事发生在 1888 年的春节以后,步惠廉从上海赴苏州的途中。——原注

生的,是为了纪念年初五的神而举行的盛宴用的。房间里面还会有财神本人,以三种形象被色彩鲜艳地画在长条纸上,注视着这些为纪念他而做的准备。一个不太幸运的观察者是饭桌上的一条活鲤鱼,被拴在绳子的一头,抽搐着。如果这条可怜的鲤鱼能够活到黎明,在被放生时活着游走,这家店的主人便会在这一年有好运。

在次日盛大的宴会上,这家店的伙计会知道他们是否还会在来年被继续雇佣。那些被邀请来赴宴的人是幸运者,而那些不被邀请的则明白他们被解雇了。这只是注重面子的中国人的另一个可爱的发明。

当到达住处时,宋停止了谈话。这是一个两层楼的瓦顶房子,挨靠在一排同一类型的房子中。夜晚,房屋沿街都已上了门板,他打开了其中一扇门。

“敬请光临寒舍。”他模仿东方式礼貌说。

经过一个小庭院,他们进了一间既是卧室又是会客室的房间。屋子的角落有一盏油灯,窗子上的裂缝用纸糊上了,以避免冷风吹进来。宋知道温暖的室内很舒适。他褪下外套,套上棉睡衣,并邀请伯克也脱去罩衫。

“我永远不会真正像一个中国人那样穿着我所有的户外服装坐在冰冷的屋里。”他说。

不一会儿,年轻的妻子走了进来。她端着为这两个男人准备的两杯茶。当宋介绍她时,伯克有了一个比什么都重要的发现。她的稳固而完美的脚步,像任何一个美国妇女一样优美。他在中国所待的时间还不长,但即使这样,他也已经习惯于看见中国上流社会的女子挪着畸形的脚蹒跚地走进房间。他想起宋的关于倪家决定不再继续裹他们的第三个女儿的故事。

三个人坐在屋里谈话。宋夫人用中国话讲,由查理翻译。她懂得一些英语,但不太敢开口讲(她终生都这样)。不过,查理的

上海话越来越流利了，他翻译起来毫不费力。不知怎么，他们聊起了缠足的话题。

“我想我妈妈是真正地比我爸爸更高兴不再缠我的脚，”这个年轻女子评论道，“她跟大家一样充分了解缠足的痛苦。你听说过她是如何用她缠着的小脚逃出太平军手心的吗？”

伯克没听过，宋便为他的妻子翻译。

当1850年太平军攻入时，宋夫人的妈妈还是一个小姑娘，住在徐家汇的徐家。她的父亲，谥号福运，是护卫徐家汇的清军统领。1853年，当叛军狂扫而入，攻陷上海时，这位父亲战死沙场，徐氏被迫举家逃命。

六英里之外就是公共租界，那是他们唯一的避难之地。他们没有运输工具，被迫徒步奔跑在沟渠和稻田间的狭窄小路上。对裹成小脚的宋的未来岳母和其他女人而言，这是一种折磨。徐姑娘一次又一次地感觉筋疲力尽，但想到身后成群的疯狂叛军，她不敢停下脚步。

在那次战斗中，令这个姑娘最揪心的事情是丢了家里的珠宝。她自己亲手把它们用布包起来，想带走的。但它们太沉了，她只好让它们被叛军抢走。从感情上说，这些珠宝是无价的。绝大多数取自一套礼服和头饰上，是明朝皇帝送给徐光启的那个以教名甘地大(Candida)而著名的女儿的。

宋继续更详细地介绍了甘地大。她是伟大的徐的寡居女儿，对基督教极度虔诚。她在全国建造了20个教堂和育婴堂，印刷了上百份宗教小册子和书籍。她把北京的盲眼说书人集拢起来，给他们灌输圣经知识。然后，他们分散开去，讲述刚学到的圣经，以代替他们以前的关于三国的剑与血的传说。皇帝对所有这些表示赞赏，授予她“贞女”称号，并送了那套礼服和头饰。

当宋结束这一故事时，他的妻子离开房间去准备晚饭。两个

男人继续谈话。伯克认为宋虽然不曾求婚,但他是真正地爱他的妻子的。他还为她的血统而自豪。她的祖先在明代为官,明代是中国最后一个纯正的朝代,这一想法不断地激发起了他的爱国心。那时的宋也许已经考虑退出布道团,积极从事反对满族侵占者的革命活动;虽然这一想法是在他辞职的两年以前就有了。

“比尔,有时候我认为如果我真的从布道团脱身,我能够为我的人民做更多的事情。”在昆山的那天晚上,他就说了那句话。“你知道我在我所供职的布道团所施加的精神和物质压力下的感受。”

宋总是那样坦白。他承认最主要的物质负担是他的薪水。他得到的是大约每月 10 美元的华人牧师的基础工资,如果他有孩子的话会再涨一点。然而宋认为他的位置相当于某些外籍传教士,给他的薪水带有不公平的歧视,他为此很不高兴。艾伦博士的预言应验了。

“但是请相信我,比尔,”宋迫切地要求道,“如果我确实离开了布道团,那决不意味我放弃了为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折磨的基督传教。我将继续始终为这一使命而尽力。”

伯克相信他,尽管他希望查理不要离开布道团。他喜欢看见一个人坚持把一件事做到底,不管如何不平等。但他不想跟他的老朋友争论这件事。这也许是查理本人不得不作的决定。

二十一

义和拳

当伯克一家在 1896 年回到中国时^①,中国的维新派正在对中日战争作出强烈反应。他们并不仇恨日本人。更确切地说,这种

① 步惠廉曾于 1895 年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第一次回美国。——原注

感情是一种自我反省。败于自己所鄙视的“倭人”之手，这比之前所有的西方列强的痛击更能把中国从昏睡中震醒。“新学”的呼声更加高涨。外国教会学校不断涌现，留学潮也不断高涨——大多数学生去了日本！

在政治上，反对旧制度的激烈运动正沿着两条道路进行：一个是单纯对现存满族政府机构进行改革；另一个是推翻腐朽的王朝，建立由纯中国人统治的共和政府。同盟会是主要革命团体之一，由理想主义的广东人孙逸仙领导。孙因被悬赏捉拿而长期流亡海外，但他的秘密团体未受影响。它在上海尤为活跃，其成员之一不是别人而正是基督教牧师查理·宋。

在伯克一家从美国回来的第二天，宋邀请他们去他家晚餐，他到码头迎接他们。他不再是昆山的那个收入微薄的监理公会传教士了。事实上，1890年辞职后，他就不再是传教士了。但他保留了他的传道执照，并继续活跃于基督教工作之中。他在主日学校^①的一个班级里做老师，是组建中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活跃分子。退出布道团后，他随即开办了他的主要企业，为他以前的雇主印刷中文圣经。他开办了一家小型的商业性印刷馆，并且很快赚到了钱，比他以前做传教士挣的要多。另外，他用他的印刷厂为同盟会印刷大量的宣传革命的传单和小册子。最近，他又有了一个新的兴趣——面粉业。中国一个富裕的家族在上海造了一家面粉厂，他们正确地判断出宋在美国养就的率直性格会在现代商务中产生利润，于是挑选了他做经理，他一直担任此职直至去世。

宋在他的虹口新居款待他的大学朋友和妻子，那里离艾伦博士的“官邸”不远。可是当时他没有告诉伯克，他的家还是革命者

① 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又称主日学，是教堂利用星期日正式礼拜前一个多小时，开设的一个宗教文化班。——原注

的秘密聚会点之一。房子很大,这是正常的,因为宋家正变得越来越富有。当时有两个女孩葛龄(Eling 有时拼作 Ailing)和庆龄(Chungling 有时拼作 Chingling)和一个男孩子文(Ts-vung)。在这个家庭的传教士朋友当中,这个儿子以他的洗礼名“保罗”(Paul)而著称。宋向伯克解释道他特别用第一个基督教传教士^①的名字给 T. V. (当时而且以后,人们一直用子文的双音节中文名字的首字母叫他)命名,是希望儿子能继承他(宋)所放弃的事业。宋经常为退出布道团而表现出良心上的不安。

宋的宗教虔诚和他的革命救国愿望一样是毫无疑问的。他本不必如此执著于他的宗教和政治活动,因为他有一份稳定而宽裕的收入。宗教被积极地表现在这个家庭中,越来越虔诚的宋夫人支持她的丈夫,让全家遵循监理公会的方式生活。天天祷告,严格禁止打牌和跳舞,而且星期天禁止任何娱乐。

.....

伯克的另一位朋友也受到了这次反动恐怖^②的影响。那就是查理·宋。他的革命活动以前就被人所知,但在提倡新学的时候,从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③。现在情况不同了。同盟会和同类组织隐藏得更深了。其中一些成员离开了中国。另一些人,包括宋在内,利用了投机的葡萄牙人提供的方便。只要一些“特殊服务费”,葡萄牙领事就能给任何一个人一张葡萄牙的护照。宋办了一些这类的文件,准备一旦被清政府逮捕,就宣称自己具有外交豁免权,不受中国法律约束。

.....

① 即使徒保罗。——原注

② 指慈禧太后发动的镇压维新运动的戊戌政变。——原注

③ 指屠杀戊戌六君子。——原注

二十二

在社会各阶层中的传教士

1899 年秋,正当义和拳蓬勃发展时,伯克被派往上海,在那一教区^①担任主持工作的长牧^②。这是一个重要的位置,但他不愿离开松江。

他的新总部是慕尔纪念堂(Moore Memorial Church),位于汉口路和云南路口,一个街区以外的运河(即今天的虞洽卿路^③,现在的教堂建在那里。)是跑马场^④的分界线。牧师住宅在教堂旁边的云南路上。街角是中西女塾(McTyeire School),是监理公会专为女子开办的学校。一堵高墙立在学校后院和牧师住宅之间,但伯克家的男孩子学会了爬到家中后院的树上,去看中国女孩——在他们的爸爸不注意的时候。学校里的女孩之一是查理的长女宋蔼龄。

.....

二十五

日本戏剧

伯克和艾迪(Addie)^⑤自从搬到上海来后,又增加了几个他们的小血脉。第四个儿子约翰在 1902 年 2 月出生。

① 教区(district),年议会属下最大的行政机关,由年议会设立,由会督组织。其中包含几个牧区,由一位教区长负责督导。——原注

② 长牧(Elder),教会内教牧职分中第二个也是最高的职位。另一个职位是副牧(Deacon)。——原注

③ 即今西藏中路。——原注

④ 在今西藏中路至黄陂北路之间,共计 430 亩地。——原注

⑤ 全名 Addie Gordon,步惠廉的妻子。——原注

那一年,这个高大的传教士看到了他的第一辆汽车(两辆1902年进口到上海的奥尔兹汽车中的一辆),它像受惊的野牛一样闪电般地穿过杭州路^①。在义和拳之乱结束后,殖民地掀起了繁荣的波浪,有轨电车也随之出现。当地人认为无轨电车的电线里住着魔鬼,这想法一点儿也不坏。

那些日子里,伯克常常看见宋。这位牧师兼面粉厂主的家也扩大了。到1903年的时候有了五个孩子。第三个女孩美龄(Mayling有时拼作Meyling)和另一个儿子子良(约翰)是两个新增加的成员。庆龄已经继姐姐蔼龄之后到中西女塾读书去了。

宋热切地希望他的孩子们能像他一样去美国受教育。他经常同他的大学朋友谈论此事,他的朋友当然鼓励他,并答应在他最大的孩子蔼龄上大学的时候给予帮助。这一时候的到来比伯克预料的要早些。1903年5月,一个星期二的早晨,伯克正坐在家中书房里,这时宋过来讨论这个问题。这个身材极矮小的中国人以他在美国养就的直率性格,直接切入主题:

“比尔,我想让蔼龄明年到美国去读大学。”

“但她只有13岁!”伯克反对道。

“我知道,”宋同意,“但她明年就14岁了,在美国再经过一年的家教或是专门学习,她就可以进入正规大学了。她的英语很流利,一直在中西女塾接受良好训练。”

伯克点点头。蔼龄一直在教会学校接受良好训练,因为她一直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学生。她在五岁的时候就在这个学校读书了,年龄比其他新生还要小。而且十四五岁上大学也不算早。课程也不像今天这样高深。

“我猜想你是对的,查理,”他承认,“要么我替你写信给格里

^① 即今九江路。——原注

上校？你还记得我说起过他并建议你到葛龄送到威斯里安去吗？”

“那正是我想要你去办的，比尔。我会为此而非常感激你的。”

杜邦·格里(DuPont Guerry)上校是伯克最亲密的朋友，他是梅肯威斯里安女子学院(Wesleyan Female College)的院长。和爱默生、圣三一和范德比尔特一样，威斯里安也是监理公会的，而且它是世界上第一所经特许专为女子开办的学校。查理一走，伯克就给格里写信介绍葛龄。他概述了他与宋的长久交往，告知后者与布道团的早期关系并强调他的监理公会牧师的身份并没有改变。

那年夏末，格里的答复来了。他非常热心于招收一个中国基督教牧师的女儿。这将是威斯里安的一个新的起点。这所学校里仅有的几名非白人学生是美国的印第安女孩，但格里确信一切都会顺利的。葛龄可以生活在他本人的家里，直到她适应过寝室生活。根据他所了解的中西女塾的标准，她也许可以作为预备生马上入学。

伯克没有耽搁一点时间，立即把信给宋看。

“这让我太高兴了！”这个中国人大叫起来。随后，马上变得严肃起来，“现在，问题是如何把她安全地送到那里。我自己不能去，而我也不想让她一个人去。”

伯克用一只手掌抚摸着蓄着胡须的下巴，犹豫着说：“这个，查理，我打算明年5月或6月和我的家人一起去休假，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将非常乐意带着葛龄跟我们一起走。我们将直接到梅肯，并会一路照顾她。”

宋感激地接受了这一建议。

伯克的休假实际上应该是在1903年，但因为这里的传教士不

够,他被劝说延长一年。那年冬天,他但愿他没有答应过延期。艾迪倒在了一种一直在中国流传的祸根上——伤寒。

她躺在家里好几个星期,几乎动弹不得。伯克停止了一切工作,待在她身边,并请来一个训练有素的护士在他睡觉的时候接替他待在她的床边。最后,在早春的时候,这个萎靡的、受发热折磨的病人能够坐起来了,以后又可以起床去乘坐一小会儿马车。医生认为到5月的时候,她可以经受得住回家的远洋之旅。三个星期的带着咸味的清新空气将有助于她增进健康。

在此期间,发生在1904年的两起事件使远东比平时更为动荡。第一起是日俄战争的爆发。2月8日夜,未经宣战,日本对俄国太平洋舰队发动了一次沉重的打击^①。那天,傲慢的沙皇军舰正毫无防备地停泊在辽东半岛尖端的亚瑟港港口^②,俄舰队司令斯特拉克(Starck)上将正在岸上为庆贺他妻子的生日而宴请他的军官们。当天晚上7点,俄鱼雷艇外出巡逻,所以当日本鱼雷艇在11点从夜幕中轰鸣而出时,俄国人误把他们当作是自己的船回来了。日本人得以在近距离连续发射鱼雷,击溃停泊的舰队。

高傲、强大的俄国人惊呆了。尽管圣彼得堡在对东京的最后通牒发出回复的过程中,尖叫着“背信弃义”、“海盗行为”、“不诚实”、“违反国际法”,但是只有法国人表示同情,并附和对日本人的指责。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几乎是无动于衷。一位美国国际法专家艾莫斯·赫西(Amos Hershey)教授在他的《国际法和日俄战争的外交》一书中甚至指出:“至少自16世纪以来,各国的惯例明确地显示出,在战事爆发前宣战是相当罕见而且完全异常的。”

① 指日本人对俄太平洋舰队分队发起的突然袭击。——原注

② 即旅顺口。——原注

1904年,第二起打搅远东平静的事件是美国国会在4月通过的更为严厉的排华法案。对于期望把女儿送往美国的查理·宋而言,这比日俄战争要令人不安得多。

中国劳工自1882年以后被排斥出美国,因为美国某些部门怨恨他们的廉价劳动力。十年后,国会重新修订排外法案,又增加了规定,要求所有在美国的中国人不管何种职业都要登记。1894年,美国与中国签订了体现这一新法案的十年条约。1904年4月27日,在中国拒绝续订这一侮辱性的条约后,国会千方百计地扩充和硬化法案。中国提出强烈抗议,两国关系因此而紧张。

移民限制一直针对劳工,并不禁止中国官吏、商人或学生进入,但即使是对待这些受到法律承认的阶层,美国似乎还是持敌视态度。至少在上海是这样,上海的报纸竞相报道进入美国港口的高等华人屈辱地被强迫监禁。

鉴于即将起程的葛龄所要面临的所有这些情况,用上海人在黔驴技穷时所说的话来讲,宋“发急”了,直到他想到了一张王牌。伯克竭力劝阻他,但查理一旦作了决定后就不肯改变。他去找葡萄牙人,向他们支付了特别服务费,为葛龄搞了一张护照,像他以前用来使自己免遭屠杀的一样。宋争辩说,作为一个葡萄牙“公民”,葛龄可以不受排华法案的影响,也不会冒被美国移民当局监禁的风险。

伯克决定乘坐高丽号太平洋邮轮,预定于5月28日离开上海。他和宋订购了船票,包了相邻的两个头等客舱(当时只有头等舱和统舱)。伯克和他的三个大儿子住一间,艾迪、最小的约翰和葛龄住另一间。

5月上旬,宋氏一家人和伯克一家人全都十分兴奋和忙碌。两个家庭的传教士朋友们也来大力帮忙,他们替身体虚弱不能劳累的艾迪干了所有的打包活。在虹口宋家,邻居J. W. 克莱因(J.

W. Cline)^①夫人监督了葛龄所有外国式样的服装的缝制,她是监理公会的。在那之前,葛龄只穿本国服装。

5月28日是一个明朗的春日。当高丽号的乘客准备登上维多利亚号勤务船时,亲朋好友们成群地聚集在外滩的公共码头上。巨大的远洋轮没有在黄浦江出现,而是停在长江上的吴淞口。

在等待上维多利亚号的一群人中有伯克、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宋和葛龄。查理一直把他的女儿送到高丽号上。宋夫人和她家其他人没有到码头来。他们喜欢用感情不怎么外露的东方式风格,在这个女孩离家前,向她道别并祝福她。

苗条的葛龄穿着一件新的西式服装平静地站着。像大多数14岁的中国女孩一样,她的外表看上去要比她的实际年龄更为严肃。她的黑发编成辫子垂在背后,辫子顶部和尾部系着黑色的蝴蝶结。她举止恬静、拘谨,丝毫没有泄露出她心中的兴奋和不安。甚至她那双明亮而智慧的眼睛也平静地凝视着前方。她身上有着一个中国名门世代精心教养所能教养出的所有镇静和自制。她的妈妈负责教养她。

在伯克的孩子中,只有最小的约翰接近葛龄外表上的宁静。他神情麻木地站在妈妈的身边,拉着她的手。他的三个哥哥,穿着短裤套装、高统黑色长袜,带着黑帽子,在家人中穿进穿出喧闹游玩。12岁的威廉用做滑稽动作来带他们,尤其当兄弟四人中有谁表现出伤心的样子时。有一次,他在葛龄身后奔跑,伸手猛拉了一下她的辫子。她烦躁地摇了摇头。但当戈登也想拉辫子时,撞上了他的父亲,后者命令立即停止“所有这种愚蠢举动”。

^① 中文名葛费恩。1897年来华,在苏州传教、办学,1911年任东吴大学第二任校长。1922年辞校长职,就上海监理公会司库。——原注

一个半小时以后到达了黄浦江口,高丽号停在那里,7 000 吨的负荷使它吃水很深。船上的主要货物碰巧是 538 箱鸦片,对其所征收的关税可以为美国财政部增收 25 万美元。

因为船耽搁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开,宋得以和伯克一家和他的女儿一起上船,并逗留一会儿。行李很晚才装上船,体检也毫无希望地拖延着,因为乘客们不理医生的招呼,老是在检查时跑开。最后,在 3 点钟的时候——该船原定正午出发——一个船员带着一面中国锣出现在甲板上,敲锣要求所有送行人员重新登上勤务船。葛龄和她的父亲在互相简单道别后分手了。

当小小的维多利亚号发动马达离开时,高丽号的乘客排列在上层甲板一侧的栏杆边。从两艘船上都冒出了叫喊声和舞动着的白色手绢。那一刻,这艘巨大的远洋轮响起了沉闷、震耳的汽笛声。一些乘客被吓了一跳,随即为自己一刹那的惊骇而大笑起来。对葛龄而言,她对轮船汽笛声的突然震惊似乎更为强烈,搅乱了她训练有素的镇静。伯克低头看见她在轻声啜泣。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见她流露出她的感情。

开船后,一顿迟来的午餐送上来了。后来,由于前几个小时的喧闹而略感烦躁的成年乘客,退回到了他们的客舱,或是在甲板上和娱乐室里懒散地闲荡。艾迪带着约翰回客舱休息,葛龄和大男孩们则留在甲板上。

伯克在娱乐室里挑了一把软椅,打开他随身携带上船的一份《北华捷报》。这份周报上统统是日俄战争的新闻。日本人刚刚在佯攻亚瑟港时攻下了金州^①,外国军事专家继续为这个小岛国

① 日军于 5 月 5 日至 13 日,在金州杏树屯以东两个海口猴儿石、小河口陆续登陆。为了打开通往旅顺的咽喉要地金州,日军首先破坏普兰店铁桥和沿途电话线,切断了旅顺和辽阳之间俄军的陆上通讯联系,又在金州南山展开争夺战。最后,日军攻下南山,打开了通往旅顺的道路,使旅顺要塞的俄军陷于孤立。——原注

的胜利而狼狈。一篇社论说,英国日报为日本的宣战而辩护,指出“日本未来生存的依靠是阻止俄国侵占中国和朝鲜”。日本人也曾那样说过。

葛龄是头等舱的唯一一名中国女孩,并因此而引人注目,所以马上就成了乘客和高级船员特别喜欢的人。不管她何时经过身边,他们都要跟她说话,她羞怯地以微笑回应,随后又恢复了她的镇静。

在海上的第三天晚上,也就是到达神户的前夜,乘客们在晚饭后聚集到甲板上跳舞。娱乐室的钢琴被搬出来放在上层甲板的角落,五名船上管弦乐队的乐手围坐在它旁边,演奏华尔兹舞曲。当伯克、葛龄和大男孩们一起过来的时候,12对舞伴正在跳舞。这位高大的传教士移到旁观者的一边,想偷窥片刻“魔鬼的活动”。当他带着他的被托管人靠近时,船上的一名高级船员盯上了葛龄。他以为对这个中国女孩来说他是不错的,于是走上前来邀请她跳舞。

“不,谢谢你,我不会。”葛龄摇着头回答道。

“好啦,再也没有这么好的学习机会了。来,我来教你。”这个高级船员坚持说。

“不,跳舞对我来说是不对的。”她坚定地回应。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一个基督教徒,而基督教徒是不跳舞的。”

于是,这位年轻的高级船员连忙退下。

当高丽号开进神户港时,艾迪正在发低烧。她和她丈夫都没有把它当回事。也许是出发时的过度劳累引起了伤寒的轻度复发,但是充足的海上空气和事先休息可以使她在到达美国之前再度康复。所以,当表示港口体格检查时间到了的中国铜锣声响起时,她来到了甲板上。日本人是这样一个多疑的民族,如果她

待在她的铺位上,他们会认为她病得很严重并滞留整条船。神户的检疫官在这方面是出名的。

检查在头等舱进行得很顺利。然而,在下面的统舱,一名中国乘客在高丽号到达神户的前一天死了。那时,船上的内科医师诊断该病例是急性肺炎,但日本检疫官无视医生的意见,他嘘地倒吸一口气,坚称这一死亡病例“疑似瘟疫”。

还没有确定这到底是不是当时令所有日本的卫生官员都恐惧得变态的淋巴腺鼠疫,但是对日本人来说这并不重要。这艘船和船上的每一个人在被允许去下一个停靠站——横滨港——之前都必须接受检疫。这可不是一次简单的检疫。所有的乘客将被带上岸,在检疫站浴室的消毒药水中浸泡,而高丽号也将被从头到尾地烟熏。这些仪式定于次日进行。

那天夜里在餐厅,西伯利(Seabury)船长试图劝说乘客们不要紧张。他指出日本人在运用他们新得到的西方知识时有时会做过头,但这件事,除了使人有些为难,他们的方法是无害的。他建议每一个人穿上旧衣服去浴室,因为衣服也许要经受相当彻底的脱菌处理。

早晨,乘客们听从建议,来到了充斥着强烈的樟脑丸味道的浴室。他们把自己的躯体深深地藏在破旧的衣服中。服从非日本的标准,男人和女人被分开,而衣服则被放在了一起。各个木桶盛满了冒着蒸汽的药水,乘客们被告知进去洗澡。然后,他们穿着发的棉质和服四散站着,直到漫长的衣服脱菌过程结束。这些衣服是不是挂在乘客客舱中的“脏”衣服,这对日本人来说没有明显的区别。

当“被弄干净”了的乘客们回来的时候,带着消毒喷雾器的日本人正把已消完毒的东西搬上船。天空把三个在甲板上的烟熏者衬得特别醒目,他们就是在那里爬上通风管,向下喷洒每一个

弯曲的暴露部分的。

如果艾迪的情况不是变得更糟的话,伯克也许会喜欢这种喜剧式的勤奋。经受了浴室的煎熬后,她发着高烧回来了,船上的医生命令她待在自己的铺位上。同时,高丽号依然在检疫中。第四天,因为把艾迪滞留这样一个炎热、肮脏的港口而窝了一肚子火的伯克,气愤地去找待在船上的检疫官。

“你们怎么在这件事上这么荒唐?”他发作道,“要知道根本就没有必要像这样滞留这条船!”

这个矮小的日本人鞠了一躬,紧咬牙关,从牙缝中发出一声客气的嘘声。“啊,十分抱歉。”他在吸了一口气之后,微笑着,心平气和地说道,“但是新规定禁止船在十天内通行。”

没什么好多说的。伯克怒气冲冲地走了。一直生活在随和的、通情达理的中国人当中的传教士永远也不会欣赏日本人毫无幽默感的规章手册式的逻辑。

当船在第十天被放行开往横滨时,艾迪已虚弱得不能起床了。伯克和医生到此时都真正地恐慌起来,决定送她下船去医院。

当高丽号一靠码头,一位乘客朋友立即去横滨总医院做准备。他带回了一辆马拉的救护车,伯克帮忙把妻子抬到车上的担架上。把她安全地送往医院后,他回来把孩子和行李带下船。

怎么安排葛龄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宋托付他一路照料她,而他也不愿意让她在没有他照料的情况下继续旅程。另一方面,他不想耽搁她,而他又无法知道艾迪的病会迫使他在横滨待多久。葛龄本人非常愿意独自走。她是个有胆量的人。另外,高丽号上还有另一对监理公会传教士夫妇,他们是伯克的好朋友。于是这事就定了。他把葛龄留给这对夫妇照料。

伯克和他的儿子们在医院里度过了第一夜。第二天,一个传

教士朋友从东京来把孩子接往他在那儿的家中。伯克留下来陪伴艾迪。她在绝望中挣扎了两个多星期后,死于6月30日,她39岁生日的一个月之后。她被葬在横滨。

二十六

欢迎来到美国

高丽号驶离横滨的那天下午,葛龄离开她的寂寞的客舱,去拜访伯克托付照料她的那对传教士夫妇。他们不在,但是客舱的门敞开着,所以她坐着等他们。传教士夫妇不一会就下到走廊上来了。当他们走近时,那位妻子大声说:

“离开这个地方真是一种解脱。我对那些肮脏的中国佬和可怕的小日本厌烦透了。但愿我今后再也不会看到他们了。”

这个年轻的中国女孩内心中的某些东西破灭了。当这对夫妇进来的时候,她站了起来并胡乱编了一个来访的理由。她原本想待在这聊天,但现在她希望返回自己的客舱。那个本不该由传教士的口中说出的倒霉的评价使葛龄的心从此变得冷酷无情。

然而,第二天,一位另一种类型的传教士走进了这个中国女孩的生活。葛龄至今只记得她是“蓝曼(Lanman)小姐”。当蓝曼小姐敲门并介绍她自己时,葛龄正独自一人坐在客舱里。她是一位中年美国妇女。

“我来自朝鲜。我在横滨上了这条船。”她说,“我听说了在那位可怜的牧师妻子被带走的时候,你是如何被一个人留下来的。我想知道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这位陌生人的声音里的善意和真诚化解了瞬间的敌意,葛龄完全被征服了,两人每天都在同一个桌子上吃饭并且互相交谈。

蓝曼小姐将要回家休假,她经常讲起她年迈的父亲,他病了,她急着想再见他一面。

在横滨搭乘高丽号的还有其他乘客和货物,其中有价值 200 万美元的日本黄金准备运去美国保管,还有杰克·伦敦(Jack London)^①。两者都是日俄战争的积极提醒者。杰克·伦敦因被突然中止在朝鲜报道战争而回国。他在船上非常健谈,对日本人限制新闻自由愤恨地抱怨不止,并预言俄国军队一定会胜利。

高丽号驶过金门大桥外浓雾弥漫的堤岸后,于 6 月 30 日早晨到达了旧金山。这一天是艾迪在横滨去世的日子,不过在日本是 7 月 1 日。移民局官员来到船上,锣声响起,通知大家在娱乐室检查护照。葛龄自信地走向主检验官坐着的桌子。她递上她的葡萄牙护照。检验官绷起了脸。

“你想用这些东西过关吗? 这种办法已经被很多其他中国人试过了,小姑娘。这不行。你就在这儿待着,直到我们准备好带你到拘留所去。”

葛龄一下子完全失去了镇定。

“你们不能把我关到拘留所去,”她爆发了起来,扎着蝴蝶结的辫子劈啪作响,“我是头等舱的乘客,不是统舱的。”

那个吃惊的检验官正要说什么,这时蓝曼小姐停步在葛龄身边。

“你们当然不可以把她关进拘留所。”她宣布,“我要跟她一起就待在这儿,看你们怎么样。”

两位女性所表现出来的气势显然使那个官员泄了气,因为葛龄不去拘留所。但她也不能马上上岸。她一直待在高丽号上,直到船准备再次出航。随后她又被转到停在海港里的另一艘远洋

① 美国著名作家。——原注

轮上,然后是第三艘和第四艘。曾被伯克要求照看她的那个传教士家庭在高丽号一架好跳板后就离去了,他们仅仅令人讨厌地跟这个女孩讲了一声他们要走了。蓝曼小姐忠于诺言,独自留了下来,尽管她急于去见生病的父亲。

葛龄的另一件幸事是克拉伦斯·里德在旧金山的出现,他是伯克在中国的第一位顶头上司,也是给她父亲证婚的传教士。他在任监理公会在太平洋东岸工作的主管人之前,驻加利福尼亚港。伯克曾经在横滨交给葛龄一封给他的信,蓝曼小姐曾上岸送出这封信。里德得知老友女儿的处境后很苦恼,他给在纳什维尔的差会发了一份电报。差会接着上诉到华盛顿。最后,经过在旧金山海港内三个月的穿梭往来后,葛龄终于踏上了美国的土地。

宋的女儿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在那年夏天受到美国官员冷淡对待的高贵华人——虽然因为她的葡萄牙护照,她有更多的理由被冷淡。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带领 15 名学生来美国读大学的华南两省教育监督陈靖陶(Chen Chin-taio,音译)对记者说,他的这团人蒙受了“各种耻辱”,包括回答幼稚的算术问题(“两个苹果加两个苹果是多少?”)。如果不停止这种事情,陈威胁说,他将劝告他的总督将来把学生派往英国。

当然,当时要奉承天国人在美华人的举动是不会被加以考虑的。当葛龄在海港里漂浮不定的时候,旧金山的唐人街正在进行一场常年都有的帮会之争。四邑人^①分崩离析,去追随中国教育会(the Chinese Educational Society)。事态的发展骇人听闻,其中之一是企图毒死四邑叛徒冯令(Fong Ling)。他的妻子阿嫂为

① 四邑(台山、新会、开平、恩平四县)侨民于 1849 年共同在旧金山成立四邑会馆,这一会馆是旧金山最早的华裔会馆。1854 年,台山籍侨民(除余姓外)脱离四邑会馆,另成立宁阳会馆。1862 年,台山的余姓、恩平的邓姓、胡姓等又脱离四邑会馆,成立合和会馆。新会与鹤山侨民维持原来的四邑会馆,易名为冈州会馆。——原注

他做了一碗放了砒霜的汤,但聪明的他没有去拿。几天后,另一个帮会合胜堂^①加入了这场闹剧,七名合胜堂人因剪了一名萃胜堂^②人的辫子而被捕。而且这种事情一再发生。实际上,这些参与帮会争斗的人并不一直代表中国人,但一般的美国人并不了解这一点。同样,中国海岸的“美国姑娘”也不能让一般的中国人对美国妇女有大致地了解。

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伯克带着他的四个没妈的孩子乘坐中国号轮船,正在来旧金山的路上。艾迪死后不久,中国号于7月初停靠在横滨。在上海乘坐中国号的J. W. 克莱因博士及其家人的出现,使伯克的不幸稍有减轻。克莱因是伯克的老朋友,又是传教士同事。克莱因夫人照料最小的约翰,她就是那个帮忙为蔼龄准备洋装的人。她自己的女儿玛丽的年龄和约翰差不多大,两人一起玩耍。

幸运的是,中国号的乘客在海上不看报纸,否则这次航行会是一场噩梦。当时的头条新闻正在叫嚣“美国船只任由俄国舰队摆布”。俄国奇袭者出现在日本东面的太平洋上。航运界很紧张,保险费率上升。危机随着英国二等爵士号轮船被俄国人击沉而出现。伦敦的《每日画报》(*Daily Graphic*)称击沉轮船是“毫无理由的野蛮暴行”。

除了像杰克·伦敦那样的孤单的声音,全世界都在坚决反对“俄国大土匪”。甚至连《威斯里安基督教拥护者报》(*Wesleyan Christian Advocate*)也一反常态地暗示日本并不是俄国所形容的野蛮国家。这家监理公会的报纸说:

“俄国企图把目前的战争描绘为异教或东方异教徒与基督教

① 是美国华人社团北美洪门致公堂的12大堂之一。——原注

② 是美国华人社团北美洪门致公堂的12大堂之一。——原注

之间的斗争;但这是一个日本是否和俄国一样不完全信仰基督的问题,如果不是根本就不信的话。”

“就是这样!”《拥护者报》的编辑可能会加一句。

当中国号于7月25日停靠旧金山时,前来迎接的葛龄和里德站在码头上。她上岸已有三天了,但还没有动身去佐治亚州。里德给她看了告以伯克从横滨启程的电报,于是她决定等待。伯克夫人去世的消息令人伤心,因为,像蓝曼小姐一样,艾迪是那种让人们敬爱日增的传教士。然而,再次和伯克和这些男孩子们在一起却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这位牧师很高兴又有葛龄同行,因为她知道如何比他更好地照料约翰。

在他们乘上火车横跨大陆时,伯克想把美国的风景指给这个中国女孩看。他也许会在她好奇和兴奋的反应中忘却些许悲伤。但他极端地失望了。他错误地以为葛龄会像美国儿童那样“看得目瞪口呆!”这个小小的、严肃的东方人的女儿默默地看着所有他指给她看的東西。他还不如去招待一个石膏像模特,以唤回所有被压抑的快乐。

在梅肯,当火车在8月2日夜晩抵达时,车站上有一大群表示同情的朋友在欢迎他们。对伯克而言,这次回家确实不是一件高兴的事。不仅因为他失去了艾迪,而且他的父亲也在他上次回家后去世了。

葛龄自然成为梅肯人十分关注的对象。对一个中国女孩进入威斯里安读书,他们的意见有些分歧。第二天,《梅肯电讯报》(*Macon Telegraph*)非常详细地报道了她的到来:

今天凌晨零点三十分,中国女孩宋葛龄小姐在W. B. 伯克牧师的陪伴下,来到了梅肯。她在前往威斯里安学院的路上,在旧金山被扣留在船上。伯克牧师先生在从上海返回的途中耽搁了一段时间。伯克夫人在归国途中死于横滨,人们将铭记在心。这

位中国女孩在旧金山受阻时,等候着伯克先生的到来。

宋小姐是一位信奉基督教的中国母亲的女儿,她在上海长大。她的父亲希望她在美国完成基督教的教育,以使她获得在本国人民中间进行基督教工作的资格。

“作为一个孩子,她是我们自己的传教工作的产物。”威斯里安的院长格利昨天说,“我们的传教士伯克先生在今年夏季回来探亲时,高兴地帶她一起来到美国。他当然为她首选了威斯里安学院,因为他的姐妹和侄女有很多人都毕业于此。”

伯克牧师先生致函格利院长,欣然安排这位中国基督教牧师的女儿来此学习,并根据院规预先为她做好准备。

当伯克牧师先生抵达旧金山后,这位中国女孩与他结伴而行,这样,她就不用单独一人横跨大陆来威斯里安了。据说这个女孩非常聪明。

“她当然不必强迫自己与别人交往,也不会被其他任何年轻女士强迫这样做。”格利院长进一步说,“她们将是自由的,可以自己决定如何相处。我毫不担心她会受到人们和蔼而有礼貌的对待。”

就格利院长所知,即将成为该院学生的宋小姐是该院的第一个中国女孩。但众所周知,先后曾有几名印第安女孩来威斯里安读书。

正如上校答应过的那样,蔼龄在第一年与格利家人生活在一起,这家人非常喜欢她。她也被威斯里安的学生热情地接受了。她根本不必“被其他任何年轻女士强迫”。其他的年轻女士反而强迫自己与她交往,并在一份学院的出版物上称她“很迷人”。到达一个月后,她开始了预科生的学习。在星期天的早晨,她与其他年轻女士一起沿着长长的下坡道走到桑树街监理公会教堂(Mulberry Street Methodist Church)去,这个教堂是“佐治亚州监理公会母堂”。第二年即将过去的时候,她改变了发型,把辫子改成了当时最时髦的高卷发。

除了认真学习外,葛龄还挤出时间去拜访华盛顿的外交界。她的姨父温秉忠于1906年1月随清帝国教育考察团^①来到华府,从而使这一切成为可能。一次,她受到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接见,并不忘提起她在移民官那里受到的待遇。罗斯福说他很抱歉。

葛龄在威斯里安读了五年书后,于1909年毕业。那时,她的两个妹妹继她之后来到梅肯——庆龄开始了一年级的正式学习,而只有九岁的美龄则在家庭教师的辅导下,直到1912年才进入威斯里安读书。次年,庆龄毕业以后,美龄去了马萨诸塞州的威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在那里她可以与她在哈佛读书的哥哥子文离得近些。

有一则趣闻为宋氏姐妹在威斯里安的岁月增添了光彩。1909年5月15日,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学院礼堂上演了两幕小歌剧《日本姑娘》。在菲奇(Fitch)小姐参加演出的声乐学生当中,有扮演日本皇帝的宋葛龄和扮演皇帝侍从的小美龄。观众手中的绿色节目单背面,印着日本国歌:

愿我皇长治久安,
愿我皇千秋万代,
直至细石变成巨岩,
长出厚厚的青苔。

二十七

艾迪的闺中密友

葛龄在桑树街主日学校的第一位教师是一位28岁的年轻女

^① 即清宪政考察团。温秉忠作为端方的随从之一,随出使各国考察政治的大臣戴鸿慈、端方于1906年1月抵达美国,在华盛顿、纽约、费城、波士顿等考察后,于2月15日自纽约乘轮赴欧洲。——原注

子,颇吸引人,头顶上的盘发是深红褐色。这个中国女孩得知她名叫莉拉·杰尔丁(Leila Gerdine)^①,是已故伯克夫人的朋友。

二十八

辫子飘舞

.....

1912年5月,伯克又一个假期来临。他准备带莉拉、约翰和小卡罗琳(Caroline)去美国。当这家人在上海时,启航前一天,宋^②和葛龄来访。这是伯克自革命爆发以来第一次见到他们。他们两人都已身处政治活动的旋涡之中。葛龄——现在是一个22岁的年轻漂亮的小姐——是孙逸仙的秘书,她的父亲是这个广东偶像的主要心腹朋友之一。孙在上海的时候就把宋家(已从虹口搬往法租界)当作他自己的家。作为帮忙,伯克被要求带一些小礼物给在威斯里安的庆龄和美龄。他当然乐意效劳。

.....

二十九

友人长逝

伯克于1913年返回中国前,威斯里安举行了毕业典礼。这位传教士参加了这些毕业典礼,以目睹他的老朋友的第二个女儿庆龄毕业。之后不久,他带着莉拉和约翰启程返回东方。

如果伯克在他返回之前认为中国人会推进他们新生的共和

① 莉拉·杰尔丁与步惠廉于1905年10月26日结婚,婚后随丈夫到松江传教。——原注

② 即宋耀如。——原注

国顺利成长,他会失望的。那年7月,上海处于混乱之中。这个口岸城市是孙逸仙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的总部。这座城市最为紧张忙碌的地方是位于九江路的一座建筑,孙的私人办公室就在那里。查理·宋在那里负责。伯克想顺道去拜访他,告诉他关于目睹他女儿毕业的事情。但是这位传教士的朋友克莱因^①劝阻了他。宋在这些天里忙得不能见任何人。

“去年春天,在开仗很久以前,我到那里去设法让孙博士为学校演讲。”时任教会办的东吴大学校长的克莱因回忆道,“首先,我在大门口见到了宋的私人车夫。他在外面做警卫。如果不认识我,我就没法进去。在他之后是另一个警卫,位置在楼梯口。在二楼,一个秘书在一间私人办公室外拦住了我,随后他进去把葛龄带了出来。我只能见到葛龄。宋和孙正在里面同党的领导人举行一个重要的会议。不过,葛龄对我竭尽友善,知道我的来意后,她说她会安排的,后来她做到了。那个葛龄是一个非常精明能干的年轻小姐。她将会在这个世界上有所作为。”

受克莱因的故事的影响,伯克没有设法去见宋,而是草草地写了一张字条给宋。之后,他就带着家人乘火车去了松江。

孙的二次革命是由于他和他的同盟会同事对袁世凯的野心和足智多谋估计不足而发生的。南京同盟会的人在1912年如此轻易地默许袁担任总统的一个理由是,他们相信在内阁和议会中占优势的政党可以控制这个北方军事家——就像其他民主国家那样。鉴于此,同盟会仿效美国模式,把自己从一个秘密的革命团体改组为一个政治党派。这个新党叫国民党,并逐渐在内阁和国会中获得绝大多数的席位。国民党还控制了许多省份,当地的

① 即葛赉恩。——原注

革命英雄(他们中的多数人是像钮将军^①那样的老同盟会员)主持着由他们夺取的政权。

这时,袁世凯开始现出原形,最初十分谨慎。他先是撤除了这些省的一些革命英雄,换上他自己军队里的人。他采用了两个东方人喜欢用的手段——收买和暗杀。当1913年3月国民党元老宋教仁在上海被枪杀时,这次暗杀或多或少地将他揭露出来。孙正要登上去北京的午夜火车,想去那就任总理并从野心勃勃的袁的手中夺取权力。^②

紧接着可疑的暗杀事件,是袁在4月未经咨询国民党占多数的国会而同外国进行了一笔1亿美元贷款的谈判。^③最后,在7月,袁世凯明目张胆地试图更换江西省当地的革命统治者李烈钧。李反对,其他三省的英雄担心如果李被撵走后他们会遭到同样的命运,于是与李联合。孙逸仙因而宣布“必须武力讨袁”,二次革命在长江下游流域爆发。

孙的麻烦是他对民心的估计不够现实。他期望他们起来为他的空想原则而战斗,就像他们在1911年所做的那样。他没有认识到人们在1911年的情绪是针对满族人的,而不是为了支持他的理想主义的共和政体计划。既然满族人走了,人们希望把和平与秩序建立起来。北京是那么遥远,他们并不关心到底由汉人的哪一方政治因素来统治。除了一些激进的学生和国民党员,没有人对1913年的再次反抗有什么热情。

松江的商会对打仗特别反感,因为松江可能是主战场之一。

① 即钮永建。——原注

② 误。孙中山当时在日本考察铁路,得知宋案后,从日本返回上海领导二次革命,并未去北京。——原注

③ 1913年4月26日,袁世凯为了筹集战争经费,压服、消灭南方国民党的势力,以办理善后为名,特派赵秉钧、陆征祥、周学熙等为全权代表,未经国会讨论通过,擅自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签订《善后借款合同》,获得2500万英镑的贷款。——原注

牛将军在那里驻扎了一支大部队,显然意在等袁的北方军队过来后开战。商会决定影响这种战略,他们找寻必要的劝诱方式。最无争议的资源就是公办孤儿院,因此它账上的2万美元转到了钮的账上,这位将军体贴地带着他的士兵在20英里之外的龙华为孙的理想而作战。

就像其他“讨袁”军一样,钮被打败了,二次革命无力而终。南京是主要的受害者——就像它过去一样,将来还是会这样——梳辫子的野蛮人张勋(一只旧老虎,仍在感情上忠于被废黜的满人,拒绝剪辫子)为袁攻取了这座城市,并放任他的军队大肆奸淫掠夺。此后,为了全面报复在1911年打败他的革命党人,张重返北方,把袁的副官冯国璋^①留在南京当江苏省省长。

同时,孙逸仙匆忙流亡日本。查理·宋和他的家人跟随着他。当宋家人隐姓埋名暂时在日本流亡时,葛龄和孔祥熙结了婚,他毕业于奥柏林大学(Oberlin College),是东京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她第一次遇见他是在纽约,当时她是威斯里安的学生。孔家是山西一个经营钱庄的富裕家族,是孔夫子的嫡系子孙——祥熙本人是第75代孙。这次婚姻是这位年轻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员的第二次婚姻。他的第一个妻子(以一种旧式的娃娃亲方式为他选择的)已经去世了。

当宋和他的偶像孙于1915年返回上海时,庆龄已接替葛龄的位置,担任这位革命家的秘书。作为监理公会教徒的宋家对此十分满意,直到有一天,他们的二女儿和孙出人意料地私奔到日本。^②庆龄只有20岁,而这位广东人50岁。更糟糕的是,孙有一个和他

① 冯当时统领禁卫军兼充总统府军事处处长。——原注

② 误。宋家人于1915年结束流亡生涯回国定居,但并不是和孙中山一起,孙在1916年才回国。1915年10月,宋庆龄在孙中山使者的陪伴下奔赴日本,在东京与孙中山结婚。——原注

同龄的妻子以及和她所生的三个孩子。确实,他在为革命闯荡世界的岁月里很少见到她,但是这并没有使他与庆龄的婚姻成为一种完全合法的行为。庆龄可以被原谅。她年轻,虔诚地满怀政治理想。孙自然成了她的英雄。但是宋和他的夫人从未原谅这件事。^①

此后有一天,宋童年时的恩人朱利安·S. 卡尔将军来上海旅游,他们两人去松江和伯克一起共度了一天。这个矮小的中国人看上去病了。他正在遭受不久后夺去他性命的胃癌的折磨。只有一次他提到庆龄的事:

“比尔,我这一生中从未受到过这样的伤害。我自己的女儿和我最好的朋友。”

查尔斯·琼斯·宋——偷渡者、传教士、面粉厂主,以及革命家——在追忆中是一个传奇人物——于1918年5月3日去世,生前并未想到他的孩子和他们的配偶有一天会统治中国。

——摘自朱玖琳译注:《詹姆斯·伯克著〈我的父亲在中国〉有关宋氏家族的记载》,
《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三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12月版。

① 孙中山是和原配夫人办妥离婚手续后才与宋庆龄结婚的,但是正如宋庆龄所言,他们的婚姻尤其不被传教士所接受。宋庆龄的父母虽然不同意女儿的婚事,但他们也没有“从未原谅这件事”。相反,他们后来给女儿补送了嫁妆,其中包括一套欧式藤木家具、一条绣着百子图的被面和一件宋老夫人在成亲时穿的锦缎长袍。1918年卡尔将军应宋耀如之邀来上海做客,宋耀如与孙中山一起招待了这位曾为资助中国革命做出特殊贡献的富商。——原注